

· 问题讨论 ·

关于北宋转运司治所问题上 “首州论”的再讨论

田志光 李昌宪

内容提要：关于宋代转运司治所是否都在一路首州这一论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学界已有讨论，但最近出版的戴扬本先生的《北宋转运使考述》一书，坚持一路转运司治所都在首州的观点。我们认为北宋诸路转运司治所约有三分之一不在首州，“首州论”不能成立。

关键词：北宋 转运司 治所 首州论

关于宋代转运司治所是否都在一路首州这一论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学界已有讨论，21 世纪初，又就宋朝路级四司即帅、漕、宪、仓的治所作了全面的论证。^①所谓首州，即指《宋史·地理志》中每路排列于首位的州府。我们认为北宋转运司治所，就元丰二十三路而言，约有三分之一的路，其治所并不在一路的首州。还有一些路的转运司治所，也并非始终都设在首州。但最近出版的戴扬本先生的《北宋转运使考述》^②一书（下文简称戴著），坚持一路转运司治所都在首州的观点。他在《北宋转运使司之设置及治所》一章中言：“按照《宋史·地理志》的编撰体例，凡载各路府州，首列者即转运使司治所所在。”^③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就此论题，再作申述，藉以廓清此论题上的似是而非之论，以求有裨于此课题研究的深入。

按“首州论”者所下的定义，我们先将《宋史·地理志》中的首州列表如下，然后看看这二十三座首州是否都是转运司治所的所在地。

① 王文楚：《北宋诸路转运司的治所》，《文史》第 28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李昌宪：《也谈北宋转运司的治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 年第 2 辑；《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文史》2001 年第 2 辑；《宋代诸路的辖区与治所沿革研究》，《历史地理》第 17 辑；《宋朝路制研究》，《国学研究》第 9 卷，2002 年。

② 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③ 参见戴著第 113 页。

《宋史·地理志》首州表

路名	首州	路名	首州
京东东路▲ ^①	青州	江南东路	江宁府
京东西路*	应天府	江南西路	洪州
京西南路	襄阳府	荆湖北路	江陵府
京西北路	河南府	荆湖南路	潭州
	大名府	福建路*	福州
河北西路*	真定府	成都府路	成都府
河东路*	太原府	梓州潼川府路*	梓州潼川府
陕西永兴军路	永兴军	利州路*	兴元府
陕西秦凤路	秦州	夔州路	夔州
两浙路▲	杭州	广南东路	广州
淮南东路*	扬州	广南西路	桂州
淮南西路*	寿州		

一 北宋转运司治所未设于首州的路

宋代京东西路转运司治所设于郢州东平府，这是我们的认识，戴先生在这点上 also 持此观点。^②但翻检《宋史·地理志》，郢州东平府在京东西路列于第五位，其前有宋州应天府、兖州袭庆府、徐州、曹州兴仁府。郢州东平府并非首州，而首州宋州应天府则非京东西路转运司的治所。

元丰时，河北分为东、西两路。东路转运司治所置于首州大名府，而西路转运司治所，也应设于此，而非西路首州真定府。因为“大名府位于河北与中原的交通干线御河的南端，是南方物资运往河北的集散地，其枢纽地位是河北其他州军所无法比拟的”^③。戴先生也持此观点，他说，“大名府所据地理位置兼有南北交通枢纽暨与辽交往必经之途的北方重镇之双重意义，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皆十分突出，迄北宋末，其通管东西路转运司的作用依然未变。”^④所以，河北西路的首州真定府非转运司治所，是两方并无异义的共识。但此与“首州论”不合，戴著有自违其例之嫌。

河东路的治所，我们认为设于潞州^⑤。戴著认为在并州太原府，并引用《续资治

① 按：标▲者，为北宋前期转运司治所未设于首州的路；标*者，为北宋转运司治所未设于首州的路。

② 参见戴著第113页。

③ 详见李昌宪《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第180页。

④ 参见戴著第117页。

⑤ 参见李昌宪《也谈北宋转运司的治所》，第205—206页；《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第180—181页。

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景德四年十一月甲戌条,真宗下令“转运使鲍中和与知并州刘综等共同商议”索还唐龙镇来麟、来美被西路契丹掠去人畜事,来证明河东路转运司在并州。显然,此论据是没有证明力的。转运使不同于州府地方官员,他须“代天子巡狩”一方,“岁行所部”,他出现的州府,未必是他的治所所在。这点戴先生是懂的,他说:“就朝廷赋予转运使的主要使命来看,对所按察范围之内的区域进行巡历,即所谓‘岁行所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公务之一”。他又说“北宋各路转运使虽然都有自己的治所,但在当时信息传递的条件下,主要是依靠巡历的形式,来完成他被赋予的各种职司。”^①以戴著所言来衡量上引,我想戴先生也会赞同我们的观点。但可惜的是,在具体问题上,戴先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断言河东路转运司治所在并州。接着,戴著引《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月丙子条,杨偕由“河东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为枢密直学士、知并州”,又引《宋史·王沿传》,“王沿以刑部郎中、河东都转运使,又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来论证“转运司治并州”,更不能成立,因为不能以杨偕、王沿由河东路都转运使升迁为知并州,就断定河东路转运司在并州,如偕、沿二人升任的不是并州,而是其他州府,那么河东转运司治所是不是也随着二人的迁转而移往它处呢?大中祥符中,陈若拙“改兵部郎中、河东转运使,赐金紫。会亲祀汾阴,若拙以所部缗帛、刍粟十万,输河中以助费,经度制置使陈尧叟言其干职,擢拜右谏议大夫,徙知永兴军府”^②。所以我们不能以陈若拙由河东转运使徙知永兴军府就认为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为河东路转运司的治所。

戴著对李昌宪先生关于河东路转运司治所在潞州的论述提出了质疑。李昌宪在《也谈北宋转运司的治所》中,论述河东路转运司治所在潞州时,引用了《宋史·孙冲传》一段文字,现摘抄如下:

(孙冲)历湖北、河东转运使。会南郊赏赐军士,而汾州广勇军所得帛不逮他军,一军大噪,猝守佐堂下劫之,约与善帛乃免。城中戒备,遣兵围广勇营。冲适至,命解围弛备,置酒张乐,推首恶十六人斩之,遂定。初,守佐以乱军所约者上闻,诏给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还,曰:“以乱而得所欲,是愈诱之乱也”。卒留不与。^③

戴著认为:“以‘使者至潞,冲促之还’而断以孙冲廨舍即在潞州,似不足以为据。北宋转运使一职,例须遍巡诸州……孙冲至潞,不必河东路治所即为潞州也。”^④然细读《宋史·孙冲传》这段文字,可以发现孙冲作为转运使,正履行其“遍巡诸

① 参见戴著第143页。

② 《宋史》卷二六一,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第9041页。

③ 《宋史》卷二九九《孙冲传》,第9946页。

④ 参见戴著第118页。

州”、“岁巡所部”的职责，其“适至”的是有“军乱”的汾州，而不是潞州。戴著“孙冲至潞，不必河东路治所即为潞州也”，是对原史料的误解。从“初，守佐以乱军所约者上闻，诏给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还”一句可知，汾州军士作乱后，朝廷使者奉皇帝颁赐绢帛的诏书径去潞州而不是去有“军乱”的汾州，这恰恰说明了河东路转运司是常驻潞州的，颁赐绢帛一事要与主管一路财赋的转运使计议实施，然转运使孙冲对待乱军态度强硬，“促之还”，致使“诏给善帛，卒留不与”。以上事迹亦载于《长编》卷一〇六，系于天圣六年正月，可知时河东转运司治所当在潞州。

我们又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倚阁忻代州和余米奏状》所载，“又缘转运使二人并在潞州，相去绝远，不及计会商量”^①，认为庆历中转运司治所置于潞州。又引《宋史·王鼎传》，鼎“入为三司盐铁副使。数与包拯争议，不少屈。拯素强，然无如之何。迁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徙使河东，卒”。鼎卒所在“潞州八义馆”^②。包拯嘉祐四年至六年任三司使。因此判定仁宗末年河东路治所亦在潞州。

又，毕仲游，哲宗时，“出提点河东路刑狱”^③，在位时与友人赵司业书信往还。在一封《与赵司业》的书信中说：“比缘岁事，出至旁近郡，欲归而得漕台公移，会议役法，因径到上党，论有不决者，少为淹留。及归太原，始得所赐教翰。”^④可见，发出公移的“漕台”在上党，即潞州，在太原的监司则是提点刑狱司。以上就是戴先生所言“论者其他佐证似更乏说服力”^⑤者，孰是孰非，我想宋史研究者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关于河东路转运司治所，应对史料进行严格甄别，并综合多条史料，形成证据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综上所述，太原虽为河东路之首州，但在太原的是提点刑狱司，转运使司则在潞州，一南一北互有偏重，正符合宋朝监司分部按举的原则，应当说是基本符合历史原貌的。靖康元年九月三日，粘罕陷太原，“运判王毖、提举单孝纯（忠）皆被杀”^⑥，据此，转运司可能移至太原，这大概是因战局需要而作的变动。由于文中不载提刑，因此亦不能排除漕、宪二司互移的可能。

淮南路北宋时屡有分合，分时则以淮南东、西路为名。其漕司治所，初治于楚州，明道后分治于楚、庐二州。《燕翼诒谋录》卷四载，“淮南转运使旧有二员，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诏徙一员于庐州。南渡以后，废江淮发运使，而治楚州

①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倚阁忻代州和余米奏状》，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86页。

② 《宋史》卷三〇〇《王鼎传》，第9961、9962页。

③ 《宋史》卷二八一《毕仲游传》，第9524页。

④ [宋]毕仲游：《西台集》卷一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⑤ 参见戴著第118页。

⑥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1页。

者移真州，治庐州者移治舒州。其后又自舒州移治无为军”^①。可以为证。戴著同样引了这条史料，但他为了证明淮南西路转运司治所“终北宋一朝”一直在西路首州寿州寿春府，断章取义，不引“南渡以后”之下的文字，为其立论预作铺垫。而是选用了《东都事略·吕希绩传》，元祐中，“除淮南路转运副使、知寿州”。我们认为这条史料是无证明力的，这点我们在论证河东路时已经说明，无须赘言。戴著又选了《刘安上行状》，谓：“安上宣和三年知寿春府，漕臣考校一路上供及支移之数，课殿最行赏罚，以风属郡。”^②以此证明淮南西路转运司治所在寿州。这与戴先生对转运使有巡历之责的认识是相抵牾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条史料同样也是无证明力的。依照戴著的逻辑，此次漕臣考校的是淮南“一路上供及支移之数”，那么淮南漕的治所，当遍设于淮南二十余州军。总之，我们认为戴先生所引并不能证明淮南路漕司治所在寿春府。

《燕翼诒谋录》明确地告诉我们，自明道时设在庐州的淮南转运司治所，至北宋末，始终未移司，南渡后才移至舒州。据《四库全书提要》言，《燕翼诒谋录》的作者王栻，为孝宗朝参知政事王蔭之犹子。蔭，无为军人。故“是书第三卷中所述无为军建置特详”。“书中又有余曩仕山阳（楚州）语，知其尝官淮北”。则作为一位南宋前期出身于淮南无为军之人，又在楚州为官，而庐州与无为军毗邻，王栻记载北宋时淮南漕司治所在庐州，是不应有误的。戴著删去能证明北宋时淮西漕一直在庐州的史料，就是要证明寿州是淮西漕治所，因为寿州在《宋史·地理志》中是首列之州，这种规避史料的论证无益于史实的求证。

关于福建路转运司治所，戴著引《长编》卷一九所记，太平兴国三年（978），“两浙西南路转运使杨克让在福州”的史料，断定其初福州为福建路漕司治所“无甚疑义”^③。兹将《长编》卷一九所记摘录如下：

太平兴国三年十二月，仙游、莆田、百丈草寇乘虚啸聚十余万，来攻（泉州）城，城中兵才三千，势甚危急……时两浙西南路转运使杨克让在福州，遂率屯兵往救之。^④

细读此条史料，我们发现戴著所引偶脱一“时”字，此“时”字颇为重要，应有“当时正在”之意。这样，杨克让在福州就不是常驻在福州或治所在福州。转运使为一路巡按之官，它不同于守土之臣、封疆大吏，我们在研究转运司治所时，不能不考虑到转运使的这一特殊职能。之后，戴著据《宋史·蔡襄传》：庆历四年“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又据张耒《柯山集》卷五〇《李处道墓志铭》记

① [宋]王栻：《燕翼诒谋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1年，第37页。

② 参见戴著第122页。

③ 参见戴著第127页。

④ 《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十二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95年，第438页。

其治平四年“福建转运使贾青系福州衙前数辈劾其盗”。来论证仁宗庆历以后福建路转运司治所已经移回福州。这两条史料是无证明力的：其一，《宋史·蔡襄传》中，蔡襄求知福州未得允许，既而改任转运使，不能因其“求知福州”就判定福建路漕司在福州。蔡襄就任转运使后不久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据《福建通志》卷七，“古五塘”在福建路泉州府，由此得知，蔡襄上任后并未在福州，而是在泉州履行“岁行所部”的职能，修筑陂塘，监管赋税。其二，《李处道墓志铭》中并未明言转运司治所在福州。转运使掌一路财赋及监察之事，“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①。贾青逮捕福州衙前，应是其岁行所部至福州后所为。此狱贾青“必欲论死，狱成，不引伏。公（李处道）令（泉州）德化，以狱属公。公缓其狱，竟青去部，卒出之”。“竟青去部”，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四字，不知何故，戴著不引。

据《舆地纪胜》卷一二九《建宁府福建路转运使》条记载，雍熙二年，两浙西南路改名福建路，治所在建州。又据《淳熙三山志》卷二五《转运副使》载，“建炎二年移司福州，绍兴二年依旧，三年复移，寻依旧”^②。清楚地说明了建炎二年前即北宋整整一代，福建路转运司均在建州。《淳熙三山志》是成书于南宋时的一部记载福州历史的方志，该书详尽地记载了治所在福州的官司廨宇及历任官员。在卷七中，列有《转运行司》、《提点刑狱司》两条，颇为详尽地记载了福建路的两个重要监司的历史沿革。该书对“转运行司”的产生做了说明：“雍熙改福建路，将输举刺自端拱明道之际，诏所属郡不辍巡按，故逐州皆有行司。”^③由此可见，福州虽为一路首州，但其只有“转运行司”，供转运使临时居住办公之用，并无治所。在福州有治所的，则是提点刑狱司。这点我们在《也谈北宋转运司的治所》中有详细的论证，不知戴先生为何视而不见。景祐元年（1034）四月与皇祐三年（1051）十一月，两次申命，“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廨宇同在一州，非所以分部按举也，宜处别州，仍条巡察之令以付之”^④。福建路转运司在建州，提点刑狱司在福州，是贯彻体现宋朝地方高层行政机构“分部按举”设置原则的又一例证。

咸平四年（1001），西川路分为益州、利州两路。戴著引《舆地纪胜》卷一八三“利州路兴元府按刑司”条引《通略》云：“皇祐三年，提、转不许同在一州，故宪居兴元，而漕居利州”。又引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明道二年，先公为利州路转运使。”《舆地纪胜》卷一八四，记利州有司马温公世德堂，温公年十三随侍父亲

①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第3964页。

②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五《转运副使》，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89年，第8册，第8005页。

③ 《淳熙三山志》卷七《转运行司》，第8册，第7845页。

④ 《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五月庚午，第2676页；卷一七一，皇祐三年十一月乙丑，第4117页。

司马池来此云云，来证明利州路漕司治于利州。此节无论是史料与观点都与李昌宪论述极其相同。^①然查阅《宋史·地理志》，利州并不是利州路之首州，而是排在第二位，利州路首州是兴元府。这与戴先生所坚持的“首州论”又自相矛盾。宋代转运司治所不全在首州，是历史事实。

梓州路设于咸平四年，该路转运司初治于梓、遂二州。据《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丙寅，“梓州路转运使寇瑊言：‘本使公署在梓、遂，去戎、泸地远，缓急边警难以照应，请徙于资州’。从之”^②。此时，梓州路漕司移至资州。《舆地纪胜·资州》卷一五七载“初，朝廷分梓、夔四路，而梓漕宅东川。大中祥符六年，寇瑊出使，屯师东川，供馈维艰，奏请置衙于兹，后复故”^③。亦可证。《舆地纪胜·遂宁府》卷一五五言：“遂宁旧为梓部台治。大中祥符中，寇瑊置于梓州。皇祐中，田况请复置司遂州”^④。该条中的“梓州”，据上引《长编》与《舆地纪胜·资州》条可知应为“资州”之误。“皇祐中，田况请复置司遂州”亦与“后复故”条相印证。《舆地纪胜·遂宁府》卷一五五又言：“提举学事，崇宁六年置，宣和二年度，以转运兼领。可知北宋末遂州遂宁府仍为梓州路漕司治所。总之，梓州路转运司可能从大中祥符时起就未设于首州梓州。然戴著引《涑水纪闻》卷一六，“何浹以录事参军提举梓州路常平仓，浹所至暴横，捶撻吏民以立威”，“气陵提转，直出其上”，甚至当“转运使李竦、判官陈充与之议事，不合，辄叱骂之。知州诣之白事，下马于门外，循廊而进，至其坐榻之侧，亦不为之起”。以及以《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1073）四月，“大理寺丞、知司农寺丞苗时中权发遣梓州路转运判官，代太常博士陈充”等事，来论证熙宁六年前梓州路漕司治所已迁回梓州。^⑤显然，其论据与论点相距甚远。首先，向何竦“白事”之知州，史未明言是何州之知州，不能证明梓州潼川府就是转运司的治所，无助于戴的观点。其次，戴先生是看过并引用过《舆地纪胜》的，当然也会见过下列史料。《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潼川府》引梓州潼川府路提点刑狱司“《题名记》言，自景德四年（1007）陈天丽始”^⑥。同书《潼川府》又言，“提举司旧在提刑司之左。提举司有重建《俞俞堂记》曰：提举司旧治武信（遂州节度使军额），使者江公衍请梓之同提点刑狱厅为新治。绍圣四年（1097），建俞俞堂”。据此，可知梓州路提刑司及同提刑司均设于梓州，而提举司置于遂宁府。绍圣四年，因潼川府路提举常平江公衍之请，以同提刑司衙署改置提举司。这说明是年以后，亦即熙宁六年以后的24年，提举司方移至潼川府。那么，再

① 参见李昌宪《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

② 《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八月丙寅，第1891页。

③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资州》卷一五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4251页。

④ 《舆地纪胜·遂宁府》卷一五五，第4198页。

⑤ 参见戴著第130页。

⑥ 《舆地纪胜·潼川府》卷一五四，第4161页。

看戴所引,何浹、李竦、陈充诸人事发生在熙宁,如果诸人议事的地点确在提举司或转运司治所,那也只能证明两司时在遂州遂宁府,并不能证明在梓州潼川府。

综上所述,可知北宋时期转运司治所未设于首州的路,有京东西路、河北西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福建路、利州路、梓州潼川府路,共计八路。

二 北宋前期转运司治所未设于首州的路

京东路转运司治所,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广济军条言:“皇朝乾德元年,东疏荷水,漕转兵食于(定陶)镇,置发运务。开宝元年,寻改为转运司。太平兴国二年,转运使何(和)岷奏请升定陶镇为广济军”^①。又《宋史·和岷传》言:岷“太平兴国二年,知兖州,改京东转运使”^②。由此可证明自开宝初(968),京东路“转运使副廨皆在广济军”^③,并不在首州青州。继广济军而为京东路漕司治所的是郓州。据《龙学文集》卷七《京东路转运使厅名记》载:“我司勋张公郎中、工部马公郎中领漕运于京东,既再稔……郓之名州惟旧,某年以河决徙今新州,而二公之署在焉。今所追录则断自徙州而下,凡若干人,徙州而上者,盖亡矣……康定二年(1041)夏六月十日记”^④。郓州以河决徙州,又见于《宋史·河渠志》,在咸平三年(1000)五月。郓州新城建成,在五年四月。时就命知郓州姚铉为京东转运使,以奖其劳。^⑤《龙学文集》作者祖无择,宝元元年进士第三人及第,宝元、康定间任齐州通判,其所记当无误。由此得知,郓州在咸平三年前已成为京东漕司治所,时置使二员,并驻于郓。京东路漕治所由广济军迁往郓州,可能与广济河道日渐淤浅,水流枯涩,漕运困难,广济军地位日渐衰微有关。然戴著谓,“尚不明朗者为,咸平三年或更早于此,郓州是否已为京东路治所”^⑥,提出质疑。不过上引“今所追录则断自徙州而下,凡若干人,徙州而上者,盖亡矣”。似可回答戴著所疑。咸平三年因河决而徙州址,但置于该州的衙署似未尝变更。青州作为京东路转运司的治所,始于景德二年(1005),时距宋立国已有四十五年之久。据《长编》卷五九载,是年三月,始“诏青州被海亘远,符牒或致淹缓,徙一人廨于青州”^⑦。此时京东路转运司分驻郓、青两地。以后直至北宋末,青州仍为京东路转运司治所。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2007年,第263页。

② 《宋史》卷四三九《和岷传》,第13014页。

③ 《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三月,第1327页。

④ [宋]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七《京东路转运使厅名记》,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098册,第820页。

⑤ 《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四月乙酉,第1125页。

⑥ 参见戴著第113页。

⑦ 《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三月,第1327页。

两浙路转运司，大略而言设于两浙路的首州杭州。这点李昌宪先生在《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一文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但他又认为，宋初两浙路转运司治所，沿唐江南东道采访使治于苏之旧制，设于苏州。在《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一文中，他引用《吴郡图经续记·下》言：“两浙转运使治所初在吴郡，孙何汉公自京东迁二浙，实居于此。”孙何为浙漕，据《长编》所记，在咸平三年六月后不久。又据《宋史·孙何传》，“景德初（1004），代还，判太常礼院”。由此得知，至少景德前两浙转运司治于苏。现在管见所及，两浙路转运司治于杭州的史料见于《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1035）六月，是时，段少连为两浙转运使，而“郑向守杭，无治才。讼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径趋少连。少连一言处决，莫不尽其理”^①。若以前者计，自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献地起，苏州为两浙路治所有二十六年，若自后者计则长达五十七年。

然戴著认为太宗时期两浙路转运司治所就在杭州，他引用了《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三和《太宗实录》卷三二的《杭州依旧置清酒务诏》：“去年两浙转运司与杭州同建议废杭州榷酤之禁，以酒曲课额均赋于民。”^②以此为据，实在牵强，因为杭州是两浙路巡属，“废杭州榷酤之禁”之事，转运使当然要与闻，要与杭州官员商议，但不能因此就断定两浙漕司治于杭。

戴著又引《长编》景德三年十月癸巳条：

右谏议大夫、知杭州薛映临决锋锐，州无留事。时起居舍人、直史馆姚铨为转运使……映遂发铨纳部内女口，鬻铅器多取其直，广市绫罗不输税，占留州胥，在司擅增修廨宇……特诏除名为连州文学。

以此来批评李昌宪在上文中所引之史料，言：“论者以《吴郡图经续记·下》记‘两浙转运使治所初在吴郡，孙何汉公自京东迁二浙，实居于此’，而推‘至少景德前两浙转运司治于苏’，证据似嫌不足。”^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昌宪引《吴郡图经续记·下》是论证景德前两浙转运司治于苏，而戴著却用景德三年之事来佐证景德以前之事，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乾德三年（965），宋平后蜀，凡得益州等四十六州府，置西川路。开宝六年（973），分峡路^④。至道三年（997）末始定制，川峡分为西川与峡路，据《宋史·李继昌传》所载，此时峡路领“二十五州军”，接近后来的梓、夔两路所辖州军数。咸平四年三月辛巳，宋又将川、峡两路分成益、梓、利、夔四路。自此迄于宋末，川峡地区转运司无所更变。

① 《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六月乙卯，第2740页。

② 参见戴著第120—121页。

③ 参见戴著第121页。

④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七，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第307页。

关于峡路转运司治于何地，史未明言。据《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春正月甲子条“云安监为云安军，又以遂、合、渝、泸、昌、开、达、渠、巴、蓬、资、戎、涪、忠、万、夔、施十七州及广安、梁山、云安三军别置水陆计度转运使，仍以知云安监、太子中允张颙充使。”^①又据《元丰九域志》卷七，“开宝六年，分峡路”^②。此非偶合，由此推知，《长编》所言设置的水陆计度转运使应为峡路所设转运使。再者，在川峡地区设置有二十州军如此之广大区域的计度转运使，除西川路外（西川路已设转运司，治成都），只能是峡路，这一点无可怀疑。下引太平兴国元年西川、峡路漕司互兼的史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然戴著又毫无根据地提出：“开宝六年正月，置蜀水路转运计度使，以知云安监张颙充使，有论者即以之为峡路，似不足为据。”^③他认为峡路始置于至道三年。不知戴先生如何看待上引《元丰九域志》？或许戴先生认为峡路不可能两置，因此否定开宝六年所置，但戴先生并未提出否定的依据。其实，北宋一代路的分合是较常见的事，尤其是宋初，此可参见李昌宪《宋朝路制研究》的《宋初转运司路的形成与发展》和《真宗以后北宋转运司路的演变》两节，兹不赘述。

戴先生否认了开宝六年宋曾设置峡路，这就釜底抽薪地从根本上否定了云安监为峡路转运司治所。我们认为宋转运使设置之初，偏重于将输转漕。太平兴国元年，以“峡盐悉趋荆南，西川民乏食”，“于是命西川转运使申文纬遥兼峡路，转运副使韩可玘兼西川路，使盐荒流通”^④。因此，峡路转运司设于产盐地云安是合乎情理的。至道三年再设峡路，其转运司治于何地，史无明文。以情理揆之，为兼顾将输、刺举两方面，可能设于夔州、梓州，或并置使、副于两地。

综上所述，可知北宋前期的数十年中，曾有京东路、两浙路、峡路的转运司治所未曾设于首州。

三 戴著疏误举例与解析

戴著在论述中存在诸多的疏漏与谬误。前述论证河东路时，误将汾州认为潞州，论证福建路，引有关杨克让的史料，故脱“时”字，即是。下面再将此类问题摘出一二，略加分析。

首先谈一下京东路。戴著认为京东路始设时间为开宝九年（976），一作八年，

① 《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春正月甲子，第296页。

② 《元丰九域志》卷七，第307页。

③ 参见戴著第129页。

④ 《长编》卷一七，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戊午，第387页。

并认为《太平寰宇记》四库本作“开宝元年”为误，应据金陵本作“开宝八年”^①。然查阅四库本与金陵本《太平寰宇记》俱为“开宝元年”，并无“开宝八年”一说。

戴著认为京东路始设于开宝九年，依据是《元丰九域志》卷一〇“广济军”条。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元”、“九”两字形近而误所致。京东路转运司恐不至于迟至太祖在位的最后一年方置。京东路始设时间应为开宝元年，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广济军》条：“皇朝乾德元年，东疏菏水，漕转兵食于镇，置发运务。开宝元年，寻改为转运司。太平兴国二年（977），转运使和岷奏请升定陶镇为广济军。”^②即可证戴著亦引用了此条史料，但将广济军误为广安军，前者为今山东定陶，而后者即今四川广安市。此或系著者笔误。

戴著在论述京西路治所在洛阳时，引《长编》卷七四，以“京西转运副使王随居河南，今在巡内，得以侍奉父母”的事例来论证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二月京西漕治于洛。其实还有早于此的，《宋史·乐黄目传》言，“（黄目）历度支，盐铁判官，迁太常博士、京西转运使。丁内艰，时真宗将幸洛，以供亿务繁，起令莅职。史寻卒，上复诏权夺”^③。真宗幸洛，在景德四年正月，可见景德时京西漕治于洛。此条较戴著所引要早四年。这两条史料李昌宪在《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都曾引用，戴先生舍后者而用前者，不知当时又是出于何种考虑。

福建路的前身两浙西南路的设置时间，戴著认为其设于太平兴国二年。众所周知，漳泉、吴越献地归附宋朝，在太平兴国三年。戴先生做出如此判断，大概是偶忘此史实。漳泉、吴越尚未收复，何以能施行区划改革，将两个割据政权合并为一个政区，一个路？不知戴先生考虑过这个史实否？《淳熙三山志》卷七《转运行司》条明确记载，“太平兴国三年，钱氏纳土，闽为两浙西南路，置使副”。再揆诸宋初政治形势，两浙西南路转运司置于太平兴国三年，是毫无疑问义的。对此李昌宪有专文探讨^④，兹不赘述。

广南西路转运司置于桂州，戴著也持此观点，但戴著所引不能为证。戴著用《长编》卷三八四，元丰七年正月癸丑条，诏“广南西路累任转运使张颢、陈倩，副使苗时中、马默、朱初平、吴潜，判官朱彦博、谢仲规，各罚铜二十斤。坐本路提举常平等事刘谊于桂州治廨舍，费官钱万缗，转运判官许彦先奏劾颢等不觉察也”。但此条史料明眼人一看便知，只能证明广南西路提举常平司置于桂，而与转运司治所无涉。戴著又引《长编》卷四九六，元符元年三月乙亥条，“朝散大夫、权广西转运副

① 参见戴著第112页下注释。

② 按：戴著第112页同引此条史料，但其误以广安军为广济军，前者在今四川，即今广安市，后者为今山东定陶。此或系著者笔误，想必著者不会茫然到认为京东路漕司治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广安军的程度。

③ 《宋史》卷三〇六《乐黄目传》，第10113页。

④ 参见李昌宪《也谈北宋转运司的治所》。

使程节为直秘阁、权知桂州”。此条亦不足据，道理我们在前面已作了申述，兹不再赘。

关于京西路设置时间，《玉海》卷一八二《乾德转运使》条言，“乾德元年正月，以沈义伦为京西、韩彦卿为淮南转运使，诸道置转运使始见此”。由此得知京西路始设于乾德元年（963）。然戴著引用《太宗实录》、《东都事略》、《宋史》、《长编》^①等其他史料来论证以往诸家之过，认为“《玉海》资料不足为乾德元年设置京西转运司之佐证。”^②特别是针对李昌宪《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一文，在乾德元年同一年内，既用《玉海》以沈义伦（沈伦）为京西路转运使，又用《宋史·沈伦传》为陕西路转运使，提出质疑，谓“所记即同一事，两处皆资以为证，其结论似可商榷”^③。对此，李昌宪曾在《宋朝路制研究》一文的“宋初转运司路的形成与发展”一节之首说，“乾德元年正月，以沈义伦为京西转运使。同年春，任命沈义伦为陕西转运使”。我们认为京西与陕西道里相接，相距不远，沈义伦在正月为京西漕后，二三月里改任陕西漕，在时间上是可以的。宋代官员的职务在数月内变动，是常事。如北宋叶清臣，庆历七年五月壬午，自知青州改知永兴军。始清臣“知澶州，不三月改青州。于是，又徙永兴军”^④。南宋周必大，乾道中奉祠，六年制授权发遣南剑州。四月自家乡庐陵启程，六月改权发遣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七月除试秘书少监兼权直学士院。^⑤宋代地方行政长官更调频繁，任期短促，地方政务实际落入胥吏之手，故宋代有“公吏天下”的说法，这为治宋史者所熟知^⑥。因此，在无法证明《玉海》史料有误的情况下，这样的理解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

然而戴著却以6页的篇幅，大谈宋初的形势，并认为京西“自五代时起，便是对洛阳或汴京以西地区的泛指”，他援引了《五代会要》卷二七闭杂条：“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十九日敕……近闻京西诸道州府逐道皆有税钱，遂不通行。”结论是：“此处京西泛指洛阳以西诸道州府，非专指一地，其义甚明。”^⑦断言京西是陕西之误，以此来否定《玉海》史料的可靠性。众所周知，五代五个王朝，仅后唐建都洛阳，因此其敕文中“京西”是指洛阳以西。但其他四个王朝建都开封，恐就不会如此使用京西一词了。在此，戴著忽视了这个历史的特殊现象，以个别取代一般。我们希望戴能再引一些开封府的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戴著认为“《宋史》成书最迟，然

① 按：查《长编》，无沈义伦出任京西、陕西转运使的记载，戴著偶有疏失。

② 参见戴著第115页。

③ 参见戴著第73页。

④ 《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五月壬午，第3874页。

⑤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首，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147册，第7—8页。

⑥ 按：关于地方行政长官更换之频、任期之短的实例，可检索李昌宪著《宋代安抚使考》，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⑦ 参见戴著第73页。

《宋史》虽然为元人所修，所据史料，尤其是北宋前期部分的内容，则多为宋亡时入于元人之手的国史原本。”^①那么，对成书于南宋末年的《玉海》作评，是否也可借用此观点呢？王应麟编纂《玉海》，史料必有所据。戴先生应当拿出实证推翻王应麟所述。戴著频繁引用《舆地纪胜》，此书成于南宋理宗朝，戴著以此探讨北宋制度，时间跨度应不算小。为何独厚于此呢？而且，成书于元丰七年（1084）的《吴郡图经续记》，所载“两浙转运司治所初在吴郡”，就被戴著在不出一条证据的情况下被否决了。^②祖无择在《龙学文集》中，关于京东路转运司治所咸平三年前在郓州的记载，也因晚于咸平“几四十年”，而被判定“与本题讨论的内容在时间上距离甚远，似可无涉”^③。更是规避《燕翼诒谋录》所载关于淮南转运司治所的史料，以就已说。

宋代转运司治所问题，是宋代地方行政制度史中一个重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课题。难就难在转运使的职能不同于州府地方官员，他须“代天子巡狩”一方，“岁行所部”，他出现的州府，多不是他的治所之地。因此，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有关记述，并不能为研究各路治所提供有效的史料依据。史料这样筛选下来，能引证的就极少，以致我们今天难以完整、明晰地再现其原貌。

（作者田志光，1981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昌宪，1947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收稿日期：2009年2月20日

① 参见戴著第72页。

② 参见戴著第121页。

③ 参见戴著第113页。